

从《古利斯坦条约》看伊朗外交

张 郭

[内容摘要] 以《古利斯坦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在伊朗争夺的结果,是伊朗半殖民化的开端;列强看中的是伊朗据有的重要战略位置和丰富资源;19世纪初争夺伊朗的主要是英法俄三国,它们在伊朗有各自的目的与意图;英法长期争夺导致了难解的世仇情结;伊朗的生存受到沙俄的严重威胁;种种因素决定了伊朗外交意图最终落空。

[关键词] 古利斯坦条约;波斯;外力;拿破仑战争

[作者简介] 张 郭,安徽巢湖学院人事处秘书、助教,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05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古利斯坦条约》对伊朗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伊朗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开端。从表面上看这些条约是沙俄入侵伊朗的结果,而实际上它是19世纪初列强在伊朗的争夺和伊朗的不恰当外交举措共同使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法争夺、俄国得利的结果。

19世纪初的伊朗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面临着封建割据和边缘省份的分离主义倾向,国外又有英法俄的殖民入侵危险。特别是沙俄的大军压境使得伊朗生存受到威胁,而边境省份的分离主义倾向和沙俄的扩张主义相结合更加重了伊朗的忧虑,自身的羸弱使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产生了对“外力”的幻想和借重意识。

正是因为对外力的幻想甚至是迷信,伊朗才不惜用“特权”相交换。而这种特权从“主动给予”到“被迫出让”,一点点削弱着伊朗的自主独立,因为这种特权的出让虽然怀着良好愿望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引

狼入室”的后果。最终,伊朗借用外力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分析可知有三个决定性原因:(1)伊朗当权者对英法之间争斗的历史缺乏了解。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历史所固有的惯性作用,还在于其导致的英法之间难解的世仇情结,正是这种“隔阂”构建了它们互视对方为自己主要对手的心理基础,这就使得伊朗在企图借用英法力量对抗俄国时不得不为它们间的相互矛盾而付出代价。(2)伊朗对当时世界局势的无知。当时世界局势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拿破仑的崛起和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地位,从英法关系角度看,拿破仑的出现及其表现出的野心,只能激化并加深英法之间固有的矛盾与隔阂,而这更强化并突显了19世纪初国际关系格局中英法矛盾的基础性与主导性;而俄国对伊朗的步步入侵一方面可能导致英法等外力的介入,从而增加实现自己目标的阻力,另一方面俄国的实力与地位及其作为潜在的结盟对象,

决定了英法在相互争斗中抛弃伊朗的可能性,而对俄伊战争采取不干涉甚至是姑息纵容的态度。(3)伊朗政府对英法的外交意图不了解。正是对英法关系的历史和英法矛盾的基础性与主导性缺乏了解,导致伊朗不能理解英法主动缔约的外交意图,这就决定了伊朗利用外力意图的“一相情愿”。

一、对外力幻想的破灭

“自进入19世纪沙俄便开始了以征服波斯为主要内容的印度计划,对属于波斯势力范围内的南高加索展开了争夺。”俄国的步步紧逼和鲸吞(如沙俄对格鲁吉亚的侵占)强化了伊朗借用“外力”的紧迫感。所以面对英国特使约翰·马尔科姆出访,伊朗迅速于1801年1月与其签订了条约。根据条约以及随后伊朗国王给各省总督和政府官员颁布的诏书(指示凡在伊朗海岸或边境地区发现法国国民,就将其处死,并要求在这方面同印度当局密切合作),可以看出伊朗对英国的期望,甚至不惜出让特权,为的只是对抗俄国;而英国人的这次出访是在其因拿破仑在欧洲的胜利而处境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为确保印度安全,利用伊朗来牵制阿富汗对印度的侵扰,强化伊朗的反阿富汗立场。最终英国得到它所希望获得的东西,不仅从伊朗获得了很多特权,而且使伊朗充分发挥了印度的屏障作用,防范了法国人对印度的觊觎。通观条约,“至于援助伊朗对抗俄国,英国人并未承担任何义务”。

当1805年9月俄军加紧了在高加索的战事之时,伊朗遂请求英国政府按约提供援助。时任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哈尔福德·

琼斯答复说,他已将伊朗的要求转达本国政府,同时仍不忘奉劝伊朗切不可有与法国人结盟的幻想,因为要法国援助伊朗是不可能的。英国虽然非常清楚俄国人的野心——占领整个波斯,从而进入波斯湾,与英国争夺印度洋,但这时的英国主要心思都已放在了同其主要对手法国的争斗上。所以与俄国已经结为联盟共同反对法国的英国政府,虽然是十分不希望伊朗倒向法国,但是也绝无可能为了伊朗而去反对其盟友俄国,故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以迫使伊朗放弃求援的要求。

求援英国不成,法国则成了伊朗借用外力的对象。在高加索北部诸城被俄军占领,英国政府对伊朗采取冷淡态度,尤其是它在军事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以至使这种援助成为不可能之时,所有这一切促使伊朗把注意力转向了法国。何况在此之前法国已对伊朗进行了外交“游说”。伊朗国王在给拿破仑的信中表示赞成与法国结盟,并指出与伊朗缔约将为法国出兵印度铺平道路。伊朗的这种表示正合法国的意图。于是1807年5月伊法签署了《菲肯斯泰因条约》。根据这份条约法国成功的把伊朗拉到自己阵营一边,伊朗不仅不再是印度的屏障而且成为法国进取印度的通道。

但是不久法国从与英国对抗的立场出发决定同俄国结盟,法俄于1807年7月签署了《提尔西特条约》。提尔西特和约使欧洲和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为了取悦俄国在提尔西特根本就没有向俄国沙皇提及伊朗问题,这实际上是抛弃自己的盟国,使之在伺机报复的俄国和英国面前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果不然,因同法国媾和而从欧

洲战场撤出的俄国军队,被派往高加索前线。

法国政府不干预伊朗和俄国战争的决策,使长期以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的英国得以顺利地展开活动。而对法国援助感到灰心失望的伊朗,面对俄国的威胁只好再次求助于英国。1809年3月双方在德黑兰签署了“纲领性条约”。不可否认伊朗的主观意图,可以说更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在英法互视对方为自己主要对手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和要求下必然会尽其所能孤立打击对手,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与潜在的联盟对象俄国交恶。这种状况决定了伊朗外交一次次次的失望。所以当英俄两国为应对拿破仑的挑战在欧洲结为联盟并肩同法国作战之时,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在伊朗问题上达成一种“默契”。这样,伊朗政府就再次上了与之结盟的欧洲人的当,在面临强敌威胁的关键时刻,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英、法、俄三国争夺伊朗的外交意图

伊朗不仅拥有丰富资源而且据有重要战略位置,不同时期列强觊觎伊朗的主要目的是不同的,19世纪初列强更看中伊朗在争霸中的战略地位。对于英国来说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是其近代以来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保持其对印度的独占地位,避免其他列强特别是法国在印度的卷土重来。英国在乎印度是因为“印度财富的流入大大的增加了英国的现金资本——不仅增强了它的活力的储备,并且大大增强了它的适应性和它的周转的速度可能……自开天辟地以来从不曾有投资能像从印度掠夺物中所获得的那样大的利润,因为大

不列颠把持了近50年却没有一个竞争者”。正是因为印度在殖民争夺中的战略价值和英国对印度战略价值的作用,所以英国无法容忍其他列强对印度的“觊觎”,这也决定了英国必然会千方百计地保障在印度的独占地位。而英国对伊朗的插手不仅在于商业和殖民利益,而且更看中的是伊朗对印度的屏障作用。

法国作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在英法争夺中取得优势,必然想方设法打击英国。英法的世仇情结和各自的利益需求,决定它们之间的水火不容。由于印度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意义,为了打击英国,1798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占领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在进军埃及失败后,开始筹划陆路进军印度的计划,伊朗遂成为法国进军印度打击英国的通道。拿破仑已充分认识到伊朗对于进攻印度和切断大英帝国生命线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1800年末拿破仑和俄国缔结了法俄军队假道伊朗联合进军印度的协定。

伊朗不仅面临着法英的争夺,在地缘上还面对着步步蚕食者俄国。在沙俄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中,征服伊朗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高加索地区一向被沙皇视为南下侵略的军事跳板,占领高加索向西可以控制黑海,争霸巴尔干;向东可以控制里海和波斯北部地区,进而向阿富汗、中亚和印度扩张。早在1796年俄国就决定实施以征服波斯为主要内容的印度计划。俄国充分利用英法矛盾,趁列强注意力集中于西欧之机,加紧推行南下波斯湾进入印度洋暖水海域的侵略扩张政策,侵占高加索地区,挑起与伊朗的战争。

三、法英争斗及矛盾

法英争斗的历史之所以重要如前文所述不仅在于历史所固有的惯性作用,而且还在于其导致的英法之间难解的世仇情结。19世纪初英法分别与伊朗订立针对对方的协定固然与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形势(拿破仑战争)有关,但与这种“世仇情结”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而且正是英法之间长期势不两立的争斗为俄国提供了很大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结果是英法为打击对方而拉拢俄国,这直接决定了伊朗借用英法力量对抗俄国的企图最终落空。所以对英法争斗历史的不了解成为伊朗外交失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欧洲霸权奠定于17世纪,可以说,“17世纪的法国,靠着打劫它两个最弱的邻国——西班牙和德国而强盛起来”。而《奈梅根和约》则大大推进了法国的欧洲霸权,它“是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之后的“九年战争”以及作为其结果的《里斯维克和约》则大大削弱了法国的欧洲霸权。“如果说《奈梅根和约》是法国欧洲霸权鼎盛的标志,那么,《里斯维克和约》是法国欧洲霸权衰落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称霸欧洲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兴起和发展。荷兰虽因经济畸形,在竞争中落后了,但英国的发展则很迅速,它过去在海上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西班牙和荷兰,在“九年战争”中又粉碎了欧洲霸主法国的舰队。《里斯维克和约》使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英国已经获得欧洲大国的地位。在西班牙王位战争中,正是英国政策的调整,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从《乌得勒支和约》中可以清楚看到,英国是最大的受益

者,其国际政治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使英国一跃为世界头等强国。而反观法国,它无法摆脱战败的惩罚,昔日建立的欧洲霸权亦遭到进一步削弱。

《乌得勒支和约》导致了欧洲国家力量的重新配置,“在欧洲大陆,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而在海上,英国获得了主宰权”。无疑英国处于大国仲裁者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获得正是建立在法国欧洲霸权与国力衰落的基础之上。

法英地位与实力的此消彼长、之间矛盾的积累与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虽说是德意志内部之争,但它一开始就是以英法两大国的角逐为背景的。“1744年英法对抗演变为正式战争后,英法战争又是主要的了”。而这次较量的结果是法国再次败于英国。之后形成的局势是法国不会甘愿认输,英国也不会就此罢手,于是,英法的对抗将使西欧的其他一切问题相形见绌。

之后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英国仍然是胜利者,是最大赢家;至于法国,情况则完全相反,昔日欧洲泱泱大国,“已降低到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地位”。^[4]

注释: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年》第16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386-38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弗·彼·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1卷上)第293、349、35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第134、20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28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威廉·爱德华兹:《欧洲史笔记》第157页,伦敦1928年版。